

关于中央苏区理论宣传工作的回顾与启示

刘 维 菱

(江西省博物馆)

摘 要

全文以现存的历史文物为依据,较系统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的历史。文章对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克服重重困难、广泛翻印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理论读物,从而为不同层次的人进行学习、宣传创造了条件作了详细介绍;对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从实际出发、因人而异地应用不同形式,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这些历史经验,为当今在各行各业传播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并加深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培养更多的懂得马列主义原理的实际工作者,仍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并在中国广泛传播,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行研究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出了不少,本文仅阐述中央苏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理论宣传工作的历史,为众多的研究者提供一个视角。

一、各级党政机关重视理论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理论宣传工作。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开始向农村深入发展,新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因此,向党内外宣传科学理论,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这一新形势,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努力,改进理论宣传工作,并使之在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方面朝前迈进了一大步。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把理论宣传确认为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其次,根据当时的环境和中国革命的需要,端正党的理论工作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六大政治决议案中曾提出:党的任务之一就是“加紧党员群众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个时期的经验”。1929年11月22日,又在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指出:要用提高党员理论水平,使“党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所提高,提高理论上、

本文于1991年6月6日收到

思想上之明确认识”，要“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进入农村根据地后，经毛泽东、陈毅、周恩来的努力所形成的重要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中的理论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有了较大的改进。如决议针对红军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认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教育问题“要从党内做起”，要学习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的材料，“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所以决议成为红军纠正错误思想、肃清党内各种倾向，加强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利用纪念日开展纪念活动的机会，掀起理论宣传的高潮，大规模地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决议》中再次指出：“党应比前加倍努力与更广泛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灌输到中国劳苦群众中去，来武装他们，以争取伟大的解放”。193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局又在《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信》中，重申了六大政治决议案的原则，再次强调要“有系统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计划的有目的的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的头脑，进行经常有组织的教育工作”。

以上关于理论宣传的种种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次比一次实际、一次比一次深刻和明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宣传、意识到思想意识的灌注，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的重大意义在于人心的归向，革命的成败，因而被党内外所注目。

二、广泛翻印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理论读物

因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及带强制措施的文化“围剿”，大城市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读物。只有极少数能偶尔避开检查而带进苏区，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理论宣传工作的需求。长期的战争环境导致苏区出版和印刷条件均差：用土纸作印刷用纸，用油印、石印或木刻印刷代替印刷机。翻印经典著作尤其困难：当时马列主义原著还没有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侥幸带进苏区的，只有不完整的《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和《康民尼斯特丛书》中的若干种，也有少许从国外带回的原版外文书籍，选择原著翻印十分困难。尽管环境极其恶劣。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仍积极地、有选择地翻印出版马列主义原著和社会科学书籍。现散见于各处的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934年3月由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印出版，是《马克思全书》第一种。全书把“宣言”和序编在一起，收入了七篇论著，并按时间顺序作了排列。其中包括“一九四七年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翻印本译文尽管有许多错漏之处，但它的出版使苏区干部、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的全貌，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苏区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是提高干群阶级觉悟、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及《波斯和中国》，于1934年7月刊登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68期上。《斗争》报在反第五次“围剿”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发表这两篇译文，对鼓舞和振奋红军的情绪、坚强革命信念起了积极作用。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写出了一批理论著作。为增进苏区干部对苏联的了解，苏区党翻印出版了一些马列著作。迄

今所知出版最早的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32年由中共苏区中央局翻译出版，该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基本观点和态度。该书是紧接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出版的。毫无疑问，它对苏区干部正确认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种国体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性质，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列宁著（陈文瑞翻译）《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左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32年就由中央出版局印刷出版^{〔1〕}。它们为苏区干部提供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和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采用的策略的现成经验，最重要的是帮助苏区干部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的正确道路中增强历史进程中的洞察力，学习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为纪念十月革命节，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33年9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翻印出版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列宁全书第三种是《共产党礼拜六》，在1934年以《新的领导方式》为名出版，此外还出版了其他列宁著作，以及斯大林的一些著作。

除马列主义原著外，苏区各级党组织尽可能的组织、翻印、编写出版（或油印）了一些通俗理论读物。这些读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字通俗易懂，即使是解释深奥的道理，作者也是用自己的话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作为学说，应发挥其普遍的应用作用，进行宣传和研究的根本目的仍在于指导实践，这样理论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称得上是楷模。近年被史学家们公认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力作《调查工作》（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苏区这块宣传阵地上流传时，仅是用土纸、油印装订成的小册子，1930年春，为清除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便深入到闽西作社会调查，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这些问题，《调查工作》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文中，毛泽东第一次针对教条主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等实事求是判断是非的原则（或至理明言），不管该文在当时反映如何，但只要用心阅读过这本小册子的人，就会感受到此文的与众不同，并从中得到享用终生的指导。实践证明毛泽东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理论读物还有：1932年出版的、由苏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合著的《共产主义ABC》^{〔2〕}。这是一本宣传共产主义基本理论的书，因为通俗易懂，所以极受基层干部欢迎；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于1933年为纪念“八一”建军节铅印出版了《革命领袖传略》一书，此书以二十年代初期出版的《马克思纪念册》为蓝本，摘取其中部分内容翻印出版。全书包含两篇文章：第一篇节译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著《马克思传》，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主要成就，第二篇《马克思学说》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劳农专政的基本理论。这本书在苏区很有影响，尤其是开扩了马克思及马克思学说在青年干部中的视野；在所有的理论读物中出版版本最多的要算是《马克思主义浅说》了，这是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通俗读物。最初由旅法马克思主义者为教育华工所作，1925年由中国青年社编辑出版，内容分四篇，依次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该书在苏区不断被翻印，据不完全统计，版本多至五种：1930年分别有万载县、宜春县、兴国县版本，1933年有红三军团红八军版本及湘赣苏区版本，书中附有“马克思先生简略”，因通俗易懂，印数也多，所以在苏区军民中颇为流行，但多为油印或石印。

也还有其他一些通俗读物，如《阶级斗争》、《列宁传略》、《列宁浅说》等。

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从全国文化水平低、全党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提出应用多种形式开展理论宣传的问题。这从1929年11月22日通过的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所作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决议写道:“党必须有计划地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讯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以提高党员理论水平”,除翻译马列主义原著外,还采用诸多形式。进行基本理论的启蒙教育。

第一,兴建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为干部离职学习基本理论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这类学校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学校和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校(即中央局党校)是中共中央局、少共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执行局,根据为适应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充实、提高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共同创办的,并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开学(1933年3月13日)。任弼时、张闻天、罗迈先后兼任校长,杨尚昆、董必武任副校长。《红色中华》报第60期在关于该校成立的报导中,深刻地阐明了建校宗旨:为“纪念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广泛的有系统的来传播马克思创造的共产主义”。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是根据1933年8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委会决议而成立的,并在9月1日开学。毛泽东、瞿秋白先后任校长,沙可夫等曾任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该校一次开学典礼上的祝词。阐述了建校宗旨:

“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方法,学习乡苏怎样工作,区苏怎样工作,苏维埃怎样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战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课程教育学生”⁽³⁾。这两所学校内部开设了专供中央和省、县一级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的高级班(学制为六个月)。高级班开设特别课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政治经济学)和党的建设原理。教员大多由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的同志担任,如成仿吾为学员讲授了《共产党宣言》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⁴⁾,张闻天先后三次为学员讲授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⁵⁾。潘汉年、成仿吾曾负责党校高级班的工作。各苏区省委也创办了共产主义学校(即党校),办得时间较长的有闽赣省共产主义学校,该校设横岭县枫树坞叶家祠堂,方志敏亲自兼任校长。课程设置的主要内容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史,党对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

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1931年冬成立,1933年冬扩大改名为工农红军大学。肖劲光、刘伯承、叶剑英、何长工先后任校长。校内机构几经变化,日趋完善,但在校长时间内教育方针始终不变;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政治课开有社会发展史、党的建设、红军政治工作等。

第二,成立学术组织——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

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于1933年4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张闻天的积极倡议下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和工作大纲》明文规定,研究会的宗旨是“为加强一般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备,造成达不可少的理论基础”⁽⁶⁾。研究会由理事会和正副学术书记主持工作,内设“组织部”、“研究部”和“编译部”。后在江西省、中央苏区中央局、红军直属队中先后成立分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的学术活动,计有学术演讲和专

题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组织会员听取了董必武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讲,第一次以马列主义观点在会员中宣传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⁷⁾;在全总执行局听取唐开元主讲《劳动法》⁽⁸⁾;听博古作《目前红军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演讲及《十月革命的经验与教训》的演讲⁽⁹⁾;听张闻天作《广州公社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演讲⁽¹⁰⁾;为纪念南昌起义7周年,听取了朱德作《南昌暴动》的演讲⁽¹¹⁾。通过这些演讲,进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如朱德所作《南昌暴动》的演讲,应用并宣传了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通俗解说了南昌起义的前因后果。

除学术演讲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领导高级班学员对现实问题开展专门研究,总会曾拟定六个关于十月革命的研究提纲发给委员讨论:(一)十月革命的意义在哪里?(二)十月革命国内国外环境是怎样?(三)中国现有没有这些条件?(四)俄国党采取什么策略去准备十月革命?(五)中国党现在要怎样去运用十月革命准备期间俄国党的策略?(六)纪念十月革命的意义与任务是什么?委员通过对十月革命的性质意义的研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理解。在苏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刚刚诞生,还来不及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展开讨论时,张闻天领导会员开展了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学术研究,探讨经济性质与革命性质之间的关系。张闻天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的表达可见诸于《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书⁽¹²⁾,和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讲演,前者引用了《资本论》的有关段落,阐述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和影响。红军总会编印的高级班研究提纲《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研究提纲》(第一种)就是配合这一研究的。

对红军、十月革命、国际路线问题也展开过专门研究。

苏区社会科学研究会,因规模较小,影响也不大,材料也较少见。现在找到的有寻乌社会科学研究会印发的《政治讲授大纲》,是供给会员和苏维埃训练班的教材。“大纲”宣传共产党建党学说及最终奋斗目标。以上史实足以说明社会科学研究会存续期间,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苏区的影响,联系实际开展了理论宣传和学习。

第三,以报刊为阵地,或以传单的形式联系实际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

此种形式应用比较广,遇有中心活动或纪念日即散发传单,方便易行。我们不妨选择较有代表性的传单作一剖析: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马克思诞辰112周年纪念日,发出《五·五纪念告群众书》的传单,介绍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写到:马克思“明显地指示社会进化的道路”、把“打到帝国主义、改造社会的责任,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他“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行动家”。同日由共青团上杭县委散发的《为纪念马克思诞辰告青年》一文中,对《共产党宣言》的科学结论进行了阐述,文中告诫青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科学为根本,物质为中心的。所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着实的发明,不是凭空的构造”。接着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科学结论所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

在报刊上刊登宣传基本理论的文章就更多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前夕,《红色中华》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对《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作了具有充分可读性和强烈感召力的宣传:“马克思所起草的《共产党宣言》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础,指示了无产阶级用武力推翻全部现存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解放大道!”

这一时期,《红色中华》报还刊登了一些纪念性文章。有:吴亮平撰写的《马克思列宁论武装暴动》⁽¹³⁾,昆撰写的《纪念马克思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¹⁴⁾,成仿吾撰写的《纪念巴黎公社》等⁽¹⁵⁾。这些文章,与中国现状结合,总结了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

宣传了马克思、列宁对武装暴动的论述，指示了取得暴动胜利和巩固胜利的条件；记述了马克思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历程，指出马克思作为人类解放的旗帜的巨大作用；强调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重申列宁的教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号召大家“要很好的研究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用这一锐利有力的武器去粉碎敌人，为全中国的苏维埃胜利而斗争”。

四、广泛开展的理论宣传工作所起的积极作用

通过对以上史料的简单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以极大的勇气在苏区开展理论宣传，并在实践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实践活动，我们有必要认真加以总结，以供现在和将来的借鉴。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始在苏区传播，坚定了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苏区党以多种形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在苏区的影响日益扩大，促进了苏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工作的开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虽然革命根据地在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困难情况下得以发展，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作为一种模式被普遍应用，但大多数党员、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仅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及强烈的翻身意识投入革命洪流，学习马克思主义、渴望知道马克思的热情很高，伴随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宣传形式也应运而生，如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多种形式的马列主义原理的宣传。比较正规的群众性学术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各文化层次的干部、群众提供了研究场所。它的入会条件是：“凡党团员苏维埃以及各种团体工作同志有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如能看《红色中华》或《青年实话》），愿意在理论上深造并有时间参加研究的，经本会会员一人介绍”即可为会员⁽¹⁶⁾。各级党组织在理论宣传中所作的大量组织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使干部群众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真正提高思想觉悟，认识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二，研究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使理论联系实际。苏区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决非泛泛空谈。更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及时提出问题，给以实际指导和组织保证。至今，位于瑞金县沙洲坝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文印科旧址的墙上，当年书写的“学习列宁作风。工作要实际化”的大字仍醒目地留在那里便是明证。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其“组织和工作大纲”里作了明确规定⁽¹⁷⁾。各部的职能：组织部负责“（一）指导分会和小组日常研究生活”，研究部负责“（三）提出研究问题的大纲”；同时还提出了较符合实际的研究方法：（一）理事会把研究大纲或参考材料交研究小组，由会员推定或小组长指定会员一人准备报告（还可推选一人作副报告），会员须在讨论会前详细研究。一般由小组长召集研究会。（二）研究会采取讨论方式，先由报告人作简单报告，再开展讨论，最后由报告人做结论，研究理事负责指导。此外还按水平高低分别设组，1933年8月25日下午中共苏区中央局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成立时，理事会按会员文化、政治水平分成两个研究组，按高、初级不同选择讨论材料。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助于加深干部、群众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是对待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

第三,苏区理论宣传工作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苏区所开展的理论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苏维埃时期这一工作正处于启蒙阶段,它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首先,必须在全部工作中摆正理论宣传工作的位置,充分认识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乃在于解决群众革命必胜的信念问题,经过革命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识和改造自身的历史,但认识、改造客观世界都必须以革命理论作指导。在中央苏区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苏区党首先向群众灌输革命道理,使群众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灾祸连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改变这个现实的唯一道路是革命,因为革命不但是推翻统治阶级的唯一办法,还因为只有革命中才能洗刷掉革命者身上陈腐的东西,使之变成新社会的基础。一旦群众认识了这些,便自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把革命理想变成自己为之奋斗的必胜信念。中央苏区在苏维埃政权存续的自始至终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与党所开展的理论宣传工作是分不开的。

其次,应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理论宣传,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这样革命理论就更容易被群众接受、掌握。革命运动中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水平不一样,革命意识普遍变成革命行动的过程有长有短,因此多种形式的理论宣传有助于群众认识能力的提高。如常见的文字宣传与宣传画,效果就大不一样,宣传画一目了然,很能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多种形式更能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需要。

再次是各级领导必须身体力行,带头学习革命理论。“干部带头”是中央苏区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当时,高级、中级、普通干部均按不同的学习方法学习。如在红一方面军中,成立了红军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和专门管理研究活动的“红军总会学术书记处”。为军中的高级干部开办高级班;为中级干部组织政治讨论会;普通干部则设“列宁室俱乐部等机关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线”(18)。

最后是理论宣传一定要与实际结合起来。革命理论所以能有巨大的生命力,就在于理论始终是与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经受实践的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

总之,苏区的理论宣传形式是多样的,内容大多以阶级斗争为主,在通俗化和介绍性方面居多,深入研究则比较肤浅。对于理论宣传的深度、广度及群众的情绪,张闻天在当年的文献中作了如下形象的描述:“不但在苏区内的工人中间,即在苏区内广大的农民中间,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极大的权威。在每一个苏维埃的工会的以及其他群众的机关内,差不多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马克思与列宁的遗像或是写他们的名字的红纸条,这里虽是有不少滑稽可笑的现象,如把马克思列宁当作菩萨一样供奉,然而对马克思列宁的尊敬与崇拜是到处一样的”(19)。

注 释

- (1) 《红色中华》报第40期, 1932年11月14日出版。
- (2) 《红色中华》报第24期, 1932年6月23日出版。
- (3) 《红色中华》报第170期, 1934年4月3日出版。
- (4) 见《江西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第54页。
- (5) 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22页, 198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6) (11) 《红色中华》报第216期, 1934年7月19日出版。
- (7) 《红色中华》报第61期, 1933年3月15日出版。
- (8) 《红色中华》报第69期, 1933年4月14日出版。
- (9) 见《红色中华》报第78期, 1933年5月11日出版。
见《红色中华》报第120期, 1933年10月18日出版。
- (10) 《红色中华》报第128期, 1933年11月23日出版。
- (12) 张闻天:《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34年出版。
- (13) 《红色中华》报第44期, 1932年12月11日出版。
- (14) 《红色中华》报第60期, 1933年3月12日出版。
- (15) 《红色中华》报第163期, 1934年3月17日出版。
- (16) (17) 见《红色中华》报第216期, 1934年7月19日出版。
- (18) 1933年7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和工作大纲》。
- (19) 张闻天:《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1933年9月9日。